

拥彗先驱

走向政治史学

刘小枫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拥彗先驱

走向政治史学

刘小枫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拥彗先驱: 走向政治史学/刘小枫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675-9836-2

I. ①拥… II. ①刘…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世界-文集 IV. ①D0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32040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刘小枫文集

拥彗先驱: 走向政治史学

- | | |
|-------|--------------------------|
| 著 者 | 刘小枫 |
| 责任编辑 | 彭文曼 |
| 封面设计 | 刘怡霖 |
|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
| 网 址 | www.ecnupress.com.cn |
| 电 话 | 021-60821666 |
| 客服电话 | 021-62865537 |
| 地 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
| 网 店 | http://hdsdcbs.tmall.com |
| 印 刷 者 |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90×1240 1/32 |
| 插 页 | 6 |
| 印 张 | 18.5 |
| 字 数 | 310千字 |
| 版 次 | 2019年1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9年12月第1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75-9836-2 |
| 定 价 | 88.00元 |
| 出 版 人 | 王 焰 |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传德”资助项目

献给张志扬教授荣开八秩

目 录

弁言 / 1

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 3

一 立教时刻与政治史学意识 / 5

二 武帝西征与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 17

三 司马迁笔下的远伐大宛 / 35

四 古今之变与史家之志 / 52

余论 史学对“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利弊 / 68

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 74

一 不死的国王身体 / 80

二 共和政体的政治神学问题 / 93

三 国王的身体与现代国家的起源 / 109

四 人民主权的王权论 / 136

五 基督教与欧洲地缘政治的历史纠葛 / 146

六 德意志第一帝国的兴亡 / 171

七 国王观念的永恒性 / 211

2 拥彗先驱

余论 / 232

安德里亚与 17 世纪的“玫瑰十字会”传说 / 239

- 一 “玫瑰十字会”传说的诞生 / 241
- 二 寓意的“化学婚礼” / 252
- 三 “玫瑰十字会”仅仅是文学“传说”？ / 262
- 四 “玫瑰十字会”精神的诗艺呈现 / 273
- 五 从共济会到美利坚立国 / 292
- 六 从《化学婚礼》到《基督城》 / 307
- 七 余论 / 333

如何辨识畸变的心灵 / 338

- 引言 心灵的不同颜色 / 339
- 一 何谓心灵“搁浅” / 343
- 二 “逃离诉求”与“沉沦”的灵知 / 362
- 三 沃格林的心灵苦史 / 400
- 四 灵知心灵的自我安危 / 455
- 余论 谁是我们的灵魂引路人 / 481

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 / 485

- 一 “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学含义 / 487
- 二 《新史学》呼唤新的政治教育 / 491
- 三 “新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传统 / 502
- 四 新“新史学”与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 / 508
- 五 西方文明史如何既连贯又断裂 / 519

六 “世界公民”的全球史与中国文明意识的危机 / 531

余论 “超历史的”眼光与古典教育 / 551

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 / 557

一 新今文经学的现代革命含义 / 558

二 新经学与新知识人 / 565

三 新今文经学与中国现代革命的正当性论证 / 572

余论 / 581

弁 言

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凡亲身经历过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学人抚今思昔，都会对我国学界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

笔者在1978年秋天走进大学校门，回想当年，“我们”在读什么书、能读到什么书？尚且年轻的“我们”在想什么问题，脑子里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再看如今，“我们”在思想学问和政治觉悟两方面有了多大长进？

晚近20年来，我国学术景观变化之快，即便已经成为学界中坚的“70后”和“80后”学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感觉。

184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现代列强的进逼，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迄今仍是我国学人无法卸下的时代重负。100多年来，古老的中国接连遭遇共和革命、国家分裂、外敌入侵和封锁围困，数代学人很难有安静的书桌和沉静的心态面对纷然杂陈且蜂拥而来的政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西学热”始终是主流。仅举荦荦大者，自

1978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自由民主的启蒙始终是主旋律。

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处境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又迅速出现了“世界史热”（晚近5年来尤为明显），种种高论纷然杂呈，各色译著蜂拥而至。蓦然回望新时期以来的史学，我们才意识到那里布满了灰尘，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灰尘当新鲜空气。

晚近30年来，英语学界兴起一种名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学，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在“与国际接轨”的国策指引下，我国学界也正在奋力追赶这股史学新潮。

看来，与其空言形而上学式的文明自信，不如见诸行事，重启古典式的政治史学。为了走出“新史学”的新鲜空气，我们不得不深度关切晚近的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事件，以及属己的政治共同体的伦理德性在世界历史变迁中的沉浮。

应邀为《国王的两个身体》写的中译本导言作于2017年初夏（收入本稿时有所增订），其余五文均成于2018年初夏以来，无不是偶然际遇的机缘之作，因此不按成文先后时间排序。

这六篇晚近之作谨献给志扬兄荣开八秩，以志我们自1983年以来的兄弟情谊。

2019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读董成龙博士《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moment [时刻] 注定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标志，这不仅是因为黑格尔用这个语词所标明的世界历史新阶段已经成为中国的经历，或者不易辨识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正在向我们抛出难以抵御的媚眼。毋宁说，古老中国的晚近150年历史清楚表明，新中国的崛起的确堪称世界历史的又一个kairos [关键时刻]。

问题在于，对谁来说以及从何种意义上说，当今时代堪称世界历史的又一个kairos [关键时刻]？显然，对不同的智识人来说，即便共同撞上同一个kairos [关键时刻]，其含义也可能会完全不同。

董成龙博士称自己的小册子《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着实是一篇关于《史记》的读书报告”。^①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但读者恐怕很难把此书仅仅视为一篇读书报告。毕竟，作者在题为“引言：阅读司马迁”的第一章结

^① 董成龙，《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页190（以下随文注页码）。

尾时如是说：

草此小书，以汉朝的立朝与立教为线索，贯通《史记》的叙事和司马迁的关切；重整这一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或为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思考立朝和立教的问题聊备一说亦未可知。（页19）

很清楚，作者在今天读《史记》意在因应“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可是，在上面这段表述中，“立朝和立教”作为问题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有“汉朝的”界定，第二次没有。政治思想史大家沃格林（1901-1985）既有世界政治史视野又有哲学眼力，按他的说法，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时代同样堪称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①成龙博士究竟要“思考”哪个时代的“立朝和立教”，显得刻意含糊其辞。在上引那段话之前，作者还说：

司马迁生逢立朝60余年，国朝业已展开关于德性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最终于汉武帝时期形成有关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德性的定位，从而规范了汉朝以后的国朝道路，这一道路甚至成为以后中国历朝“超稳定结构”的规范之一。（页18）

在整篇“读书报告”中，此类修辞或语式不时可

① 沃格林，《天下时代》，叶颖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页372（以下随文注页码）。

见。^①很明显，作者刻意将相隔2000多年的两个世界历史时空中的中国时刻叠合起来，以便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今我们身处的历史时刻与武帝—司马迁的历史时刻有怎样的政治思想史关联。

人们难免会问：世界历史上的古今两个中国时刻可以叠合起来思考吗？这样的疑问其实来自作者自己，因为他在开篇就说：自“泰西政教澎湃东来，华夏大地与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不期而遇”之后，“摆在时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我们该如何走出中世纪”（页1）。既然如此，若把世界历史中的两个中国时刻叠合起来看，那么，作者希望今天的我们关切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呢？

作者通过体味《史记》书法并追索司马迁的心法，并非仅仅呈现了自己的深切思考。毋宁说，作者把司马迁请回当代，敦促我们反省自己含混的历史意识，缕清自己赖以理解眼下身处的古今之变的政治觉悟。

一 立教时刻与政治史学意识

“立教时刻”是本书的首要关键词，就字面含义而言，它指汉武帝形塑中华帝国的那个历史时刻。由于我们的历史时刻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该如何走出中世纪”，汉武帝所形塑的中华帝国形态就是我们应该走出的历史形态。倘若如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

① 比较页18—19，页26—27，页44—46，页54，页137—138。

理解或评价历史上划时代的华夏君王。^①

在我国传统帝王谱系中，汉武帝早有“雄才大略”、承“三代之风”（班固语）的美誉。毛泽东的光辉词作《沁园春·雪》具有世界历史的现代视野，武帝在他笔下仅仅是“略输文采”，其武功至伟毋庸置疑。但是，在10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武帝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罪人：他“独尊儒术”，使得中国式“君主专制”政体延续长达2000年之久，罪莫大焉。在现代中国的世界历史时刻，武帝一度成了史家笔下的鞭尸对象，甚至其赫赫武功也遭贬低。据说，专制君主的种种毛病在他身上已经显露无遗。^②

史家贬低汉武，并非现代才有的事情。宋代大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斥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斂，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几乎与暴虐的秦始皇相差无几。今天的我们没想到，若干年前，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当今史学界名家辛德勇教授出版了名为《制造汉武帝》的小册子，“试图揭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的情况”。^③

此事的起因是，曾有某位德高望重的古史学家凭靠

① 比较页21和页102，作者在那里提到20世纪中国的两件重大政治实事。

② 吕思勉，《中国的历史》（1920），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页72-74。

③ 辛德勇，《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建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页1（以下随文注页码）。

《资治通鉴》的记载认为，武帝晚年临逝前曾经转变治国理念，不再“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并下诏“罪己”。在晚近的标准国史大纲中还可以看到，这事似乎成了武帝应当享有历史美名的证据。^①经过现代启蒙洗礼的我们难免心生疑窦：天底下真有这样了不起的君王？

德勇教授以令人赞叹的考证功夫让我们看到，下诏“罪己”这件事纯属司马光“随心所欲构建史事”的编造。不过，志在澄清史事的德勇教授颇有分寸地告诉读者，他的考证结果至多“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学生，至少就《通鉴》的西汉部分而言，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辛德勇，《制造汉武帝》，页2）。

如今的大学生恐怕不会像史学名家那样有分寸感，他们也不知道司马光罗织的那些武帝所犯下的罪行是否同样“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史料价值”，难免会因此对司马光这样的历史思想家留下负面印象。这位大政治家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竟然随心所欲编造史事，令人不齿。按现代的政治觉悟或历史意识，这类政治目的不外乎是为专制服务。大学生们一般没谁会进一步去想，为何司马光明知武帝一生“穷奢极欲，繁刑重敛”，还要编造他临终前下诏“罪己”的事儿。当今的史学家若头脑简单的话，也不会去想为什么。

武帝治国“繁刑重敛”，似乎崇尚法术，而晚年下诏

① 蔡美彪，《中华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页58；详参宋超，《汉匈战争三百年》，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页82-86。

“罪己”，又显得深谙儒术。据说，公元前136年，武帝在宫廷设立了五经博士，10多年后又指定50名太学生跟从五经博士修习儒术，无异于“创办了一所国立大学”。据此，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名家费正清说：

汉武帝差不多像秦始皇一样是个完全信奉法家的君主，可是人们一般认为，在他统治时期，儒学成为了中国宫廷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①

言下之意，武帝表面上致力于建构儒家意识形态，骨子里却施行法家式的统治。当今古史学家的说法没谁会凭空捏造，个个言有所本。《史记》的写作年代最接近武帝的时代，想必是当今古史学家凭靠的第一手史料。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我国古代的史家讲究“书法”。《制造汉武帝》最后一章以民国初期学人李笠的《史记补订》起笔，按这位史学家的眼力所见，《史记》书法可归纳为12条通例。其中一例为“段托”，意即“史贵详实，然亦有意主形夸，词务奇譎者，不可以循名而责实也”（辛德勇，《制造汉武帝》，页159）。

德勇教授由此引出一件史实：汉武帝从未独尊儒术，其治国理念实为“以霸王道杂之”。

① 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页71，比较页72-73。

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辛德勇，《制造汉武帝》，页171）

德勇教授还让我们看到，只要史家志在搞清史实，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从明代至今，都不乏这样的史家眼力（辛德勇，《制造汉武帝》，页167、172）。

武帝崇尚儒术，见于好些中外古史学家撰写的中国通史。大名鼎鼎的内藤湖南（1866–1934）说：“文景是黄老之学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则非常喜好儒学。”^①现在我们得知，即便是名家的说法也未必可信。不过，无论武帝是否真的推崇儒术，后世的史家似乎一致认为，崇尚儒术等于好政治（德政），崇尚法术等于坏政治（酷政）。

当然，按新文化运动的观点，“独尊儒术”也是坏政治，几乎与“专制”是同义词，这意味着古代中国没有好政治。但历史已翻过新文化运动这一页，广义上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至少在名义上已恢复了名誉。那个古老的问题再度出现，即如何理解汉初立朝和立教所经历的从黄老之术治国到儒术治国的转移。《道德经》由“道”引出“德”，韩非子讲法术或君王术本于“解老”和“喻老”，何以崇尚法术就不是“德”政？

①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页170；比较蔡美彪，《中华史纲》，前揭，页50；伊佩霞（P. B. Ebrey），《剑桥插图中国史》，赵世瑜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页44。